

符号与记忆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黔山遗韵

——
贵州音乐考古

蒋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符号与记忆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黔山遗韵

——
贵州音乐考古

蒋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山遗韵: 贵州音乐考古 / 蒋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61-5463-2

I. ①黔… II. ①蒋… III. ①音乐—考古—贵州省 IV. ①K87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13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黄燕生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
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
符号与记忆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陈 扬 李存雄
委 员 汪 羿 令狐荣锋 严 肃 令狐彩桃
王之瑞 郭 文 何 林 张承鹤
刘 红 龙宇晓
主 编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总 序

对符号与记忆的研究，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际人类学界，早期的象征研究始于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自维克多·特纳和格尔兹以来，象征符号与社会记忆的研究更是成了这门学科的重中之重，对文化符号所蕴涵的意义的阐释是人类学最大的学科特色。为此，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暨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就将符号与记忆研究放在最突出的位置，经过两年多的学术积累，我们主编了眼前这套“符号与记忆丛书”，目的就是要重拾“千灯交映”的生态观，在认知、学术和思想上重新把“形”“气”“神”勾连起来，动员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乃至自然科学在学术上共同“致富”，从而建设敢为人先的创新共同体、协商中和的智慧共同体、“形”“气”“神”三通的生态共同体以及美美与共的美德共同体。

符号与记忆是万象共生的本质，是社会与自然的本征，也是地天相通的元气。世间万物的存在是符号的存在，有生命与无生命互相指涉，互为环境；两个或者更多的存在物重复互动，形成记忆，实现“结构耦合”。记忆是一种结构耦合。

符号或指号的特质是物物相指，象象互涉，事事耦合。当我们看到一幅纸质地图，展开来，上面有雄鸡的轮廓，便知道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刷出来的图形和航拍到的图形一致；天上乌云密布，一阵风吹来，下雨了，云和雨有前后关联；汉语把“树”叫 shu，英语叫 tree，蒙古语叫 mod，韩语叫 namu，约定俗成，不似地图和云雨。根据指号学家皮尔士的理论，指号分三元，有形物的征象（sign），有涉指的对

象 (object), 有神智的释象 (interpretant)。地图上的中国和实测到的中国存在形似或者象似的关系; 云和雨存在连续或者顺接的关系; 不同语言的“树”有不同发音, 全凭集体约定, 不靠形似或顺接。就是这样, 形物 and 神智需要精气联络, 形有物性, 神有智性, 气有物性, 也有智性, 居中。中国古人熟知形气神三通的道理, 生活世界中, 三者互动共生, 缺一不可; 皮尔士也强调指号三元的互不可分, 交融一体。《尚书》和《国语》有“地天通”和“绝地天通”的记载, 说曾有过地天相通的时代, 民神混杂, 神可以下凡, 民可以登天, 可谓互通有无, 互补共生, 是一个形气神三通的时代。后来, 颛顼帝命大臣“绝地天通”, 阻断“民神混杂”的通道, 形神之间没有了互通之气。张光直说地天通时代是萨满时代, 这个观点给了我们启发, 也给了我们丰富的哲理想象。“乐由天作, 礼以地制”, 天地相通, 礼乐圆融。皮尔士说“人是指号”, 这是有道理的: 社会的构成要依赖符号认知和历史记忆, 更要依赖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 尤其是耳濡目染的形物, 更是不可忽略。族群与民族的现象涉及心物, 涉及把心物联结在一起的交流活动; 爱父母、爱家园、爱民族、爱国家, 层层递进, 顶针续麻, 根植于形物指号, 交流于环环相扣, 升华于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不单纯是个人心理现象, 哈布瓦赫、维果斯基、康纳顿等令人信服地指出, 社会记忆是集体记忆, 是身体记忆, 也是心物交融的记忆。可以说, 社会记忆表达了体物与神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生态关系, 在差异中重叠关联, 互补共生。人类符号的精华是语言, 社会记忆的本体也是语言。语言是物感物觉和心神心智的生态系。《礼记》说:

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 声相应, 故生变; 变成方, 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 及于戚羽旄, 谓之乐也。乐者, 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

心物互动, 形声成音, 比音而乐, 这也符合亚里士德多关于“灵魂情动, 语言乃生”的解说。虽然各民族没有共同的文字, 也没有相同的口语, 但语言毕竟是内心经验的符号, 而全人类的内心经验是相同

的。亚里士多德把史诗、悲剧诗、喜剧、酒神颂以及“绝大多数演奏术和竖琴演奏术”看作是摹仿艺术，有浓重的象似性，摹仿用颜色，用图形，用声音，用节奏，用语言，用谐声。物感物觉要“困扰”心神心智，心神心智要反串物感物觉，语言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各个要素互相制约，保持平衡。人类用身体实现物感物觉，形成长期的或者短暂的身体记忆。语言和音乐和身体记忆及其操演有关，涉及身体化的社会记忆，也涉及社会化的身体记忆。从民族译名的文本讨论（纳日碧力戈《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到民族音乐的爱国情怀（蒋英《黔山遗韵——贵州音乐考古》），再到草苗语文的“婚姻密码”（石林《黔湘桂边区的三个族群方言岛——草苗、那溪人、本地人语言文化调查研究》），等等，都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类不分民族、宗教、党派和爱好，首先是生命体，要和周围的各种生命和非生命现象共存共生，在精神和物质的交接处“美美与共”。

索绪尔式结构主义在观察和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把历时发展悬置起来，将它看作是一个个横截面的纵向累积，认为知其一便可知其余，共识重于历时。但是，这样的研究取向会脱离感性和实践，拘泥于高度抽象的“语法”或者“规则”。同时，在这个研究样式中，社会记忆被社会语法代替，历时被共识代替，指号被象征代替，“地天通”被“绝地天通”代替。要弥补这种研究取向的不足，既要回归到感性实践中来，使抽象的“语法”具有物感的基础。研究一个活的社会仅着眼于宏观规律是不够的，还需要观察细节，记录变化，分析过程，比较个案。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工作是地天通的过程，深入草根，局内观察，局外分析，进得去，出得来。格尔兹说，人类学者不可能成为被观察的本土人，而只能通过详尽的民族志，丰富已知人类学文化的样式，充实有关生活世界的认知。

皮尔士说“人是一堆习惯”。习惯的本质是什么？是体现在身体上的社会记忆。人类记忆可以体现在语言使用和概念抽象之中，也可以体现在地志景观和山水草木中，二者虽有区别，但藕断丝连，不可割裂。社会想象和民族记忆就是在这样的形神勾连、物智交融中存在和延续的。历史记忆是指号活动的积淀，有浓厚的社会属性，涉及物质存在，如塑像、纪念碑，也涉及精神，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可以想象这样的

图景：两位老同学相见，激动万分，兴奋异常，儿时同桌，白发重逢，唤起真切的记忆，藏猫猫的体感，捉蚰蚰的情形，侃大山的乡音，盘中餐的味道，社会记忆，浓浓地沉积在身体中，挥之不去，去之又来。推动历史发展、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单是价值理念、观点主义，还有乡愁别恋、对酒当歌。那对酒乡愁中的五味杂陈，心旌摇曳，才是更加基本的动力，才是更加实在的根据。美学家伯克认为，崇高与美直接产生于身体对于外界刺激的感应，即最抽象和崇高的心境离不开最具体的身体和心理官能，痛苦的事物通过身体感觉作用于人类心智，恐怖的事物通过危险感作用于人类身体器官”。听闻、触摸、味道、景观，这些都是社会记忆的物质根据；栖居、家园、地景、地志，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基底。

现时代是一个多元共和的时代，社会与文化处于极速发展变化之中，一方面社会与文化要适应发展变化的大势，另一方面它们也有自己的反作用，以内因的主动性应对外因的影响，凸显自组织的作用，内因主体和外因主体形成耦合性的生态关系。人们应该如何相处？如何互爱？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不应该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与其他至关重要的问题一道，正在定义着我们这个数字化世界的“超级时刻”。“国民国家”已经成为人类最大和最有效的默认共同体，从政治到经济，从语言到文化，从法律到教育，一个“无声”的声音在呼唤着匀质，呼唤着同一。然而，人类关系是生态关系，不是同化关系，更不是互相消灭的关系。波德里亚认为，当下世界只有社会构成，没有象征（符号）交换，没有目的，主体、政治性、经济、意义、真理、社会事物、真实事物都已消失，只剩下法则。用皮尔士指号学加以分析，这是像符断裂，即征象和对象相对于释象的断裂，即征象和对象“死亡”，只剩下释象。当然，深受索绪尔影响的波德里亚只关注西方中心城市的虚拟化，没有注意到西方世界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即存在大量非虚拟化生活），更没有注意到非西方地区生活现实。在生活世界中，形物不死，神智活跃，精气贯通。

根据贝特森的“元关联”理论，把生物体的某一部分和其他部分相比较，会产生一级关联；螃蟹和龙虾、人与马互相比，找出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会产生二级关联；把螃蟹和龙虾之间的比较和人

与马之间的比较相比较，即比较的比较，会得出三级关联。这是一个思考之梯，是关联性思考之梯，从基本模式上升到模式的模式。原本就有元关联取向的地方智慧和传统知识，既是人、自然、社会生态关联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中的文化动力。人的主体性要嵌入自然和社会的主体性之中，形成互为指号、互为环境的生态共同体。

本丛书正是从上述诸理论与方法出发，对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些重要相关问题作了新的探索，并对中国南方山地民族的语言、音乐等文化符号进行微观分析，希望作者们这些学术成果能对我国人类学民族学以及与之相关各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所裨益。

编者

2014 年 12 月

序 言

我是从事文博工作的，对艺术也颇感兴趣。蒋英先生的《黔山遗韵》，令我既亲切又兴奋。亲切的是，我在他的著作中听到了贵州民族民间用岁月录下的娓娓乐章，既悠远，又清新。兴奋的是，数千年来散布于黔山大地的民间乐舞，终于被蒋英先生汇于一册，贵州民间乐舞有了自己的历史。

蒋英先生对贵州民族音乐不仅关注、执着，同时还多几分远见、细腻。贵州较早研究铜鼓的不乏其人，20世纪末都感到铜鼓研究似乎已到尽头，没想到蒋英先生的一篇关于“布依族铜鼓十二则”的论文打破了僵局。贵州探索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家的不在少数，就没有人想到将散布于收藏单位和民间的有关乐舞的文物及历史资料搜集、整理出来，并作一番研究，而蒋英先生做了，也做成了。《黔山遗韵》就是这样一部集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和文物、历史资料于一册的著作。

贵州的世居少数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贵州的民族歌舞、音乐，是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艺术结晶。我相信，读了这本著作之后，对贵州的民族歌舞你会有一种新的感悟：贵州民族歌舞不仅多彩，而且文化内涵丰富；不仅贴近现实生活，同时也散发出深邃、厚重的历史气息。

我期盼着蒋英先生在黔山大地上的耕耘不断结出丰硕果实。

唐文元

2012年3月24日

赞 言

蒋英生长在贵州偏远的少数民族山区，深受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1985年考入贵州师范大学艺术系音乐专业学习，这是他人生历程的一大转折，入学后，我抄录《礼记·学记》中的一段，希望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大二选择专业方向，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他学民族民间音乐。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均有丰富的音乐文化，有待深入发掘、研究，能从中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大四要撰写毕业论文，他利用假期深入少数民族村寨采风、调查，了解到有关布依族铜鼓文化的信息，于是写出了《试论布依族铜鼓鼓点特征》，从此，他与铜鼓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蒋英于1989年毕业留校工作以后，虽然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工作，20多年来仍然坚持利用节假日自费下乡作田野调查，走村串户，搜集素材，掌握了丰厚的各民族铜鼓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并出版了个人第一本专著《布依族铜鼓文化》。

因工作需要，蒋英于2009年调入贵州师范学院筹建艺术学院，经过三年的艰苦创业，完成了筹建工作。最近他完成了《黔山遗韵——贵州音乐考古》的书稿，我在电脑屏幕上一口气读完，颇为感慨，看来我抄给他的座右铭确实起了作用。他能艰辛地走到这一步，除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前辈和专家们的教导与提携，有同行和朋友的帮助，有纯朴热情的各民族群众的支持，这些都使他受益匪浅。我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这些年来蒋英写了一些文章，但功底不深，其中必有粗疏错讹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使他在向自己确定的目标奋力前行过程中，走得更稳、更远、更深，收获更多、更大，为贵州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繁荣尽微薄之力。

雁 江

于贵州大学南校区

2013年1月10日

目 录

序言	唐文元 (1)
----------	---------

赘言	雁 江 (1)
----------	---------

第一章 漫谈考古	(1)
----------------	-----

第一节 在地层中寻找人类的历史	(1)
-----------------------	-----

第二节 用智慧聆听古乐	(2)
-------------------	-----

第三节 回荡在黔山秀水间的音乐	(3)
-----------------------	-----

第二章 黔山地下传古韵	(5)
-------------------	-----

第一节 长满绿锈的乐器	(6)
-------------------	-----

第二节 巧用泥土塑乐俑	(38)
-------------------	------

第三节 在砖块上的轻歌曼舞	(51)
---------------------	------

第四节 刻在石板上的故事	(52)
--------------------	------

第三章 民族瑰宝奏华章	(57)
-------------------	------

第一节 经久耐用的乐器	(57)
-------------------	------

第二节 定格的画面	(128)
-----------------	-------

第三节 崖壁上传出的铜鼓声	(144)
---------------------	-------

第四节 就地取材制乐声	(146)
-------------------	-------

第五节 翠竹的妙用	(150)
-----------------	-------

第六节 性格化的人物形象	(157)
--------------------	-------

第七节 青藤盔甲的演变	(161)
-------------------	-------

第四章 追寻尘封的音符	(165)
第一节 《大定府志》载乐谱	(165)
第二节 “学堂乐歌”进苗乡	(167)
第三节 看着符号敲铜鼓	(180)
第四节 中西合璧巧记谱	(184)
第五节 神奇木棒传歌曲	(186)
第六节 杉木记录芦笙谱	(189)
第七节 先敲铜鼓后唱歌	(192)
第八节 乌江纤夫喊号子	(197)
附录一 追寻尘封的贵州旋律	
——记痴迷的音乐考古专家蒋英	(205)
附录二 图片来源	(208)
参考文献	(212)
鸣谢	(216)
后记	(217)

第一章 漫谈考古

考古学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文，泛指一般古代的学问，我国北宋时期也出现“考古”这一名词，但各个时代考古学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现在讲的考古学，是一种近代考古学，就是通过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室内整理、编写报告及进行综合研究的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在我国也是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

近代考古学史上有这样一段名言：“一个考古学者的义务，就是要记录考古发掘中所见的一切东西，因为以后只能依靠记录，才能凭想象去重建那个遗存和使过去的那些生活具体化起来。考古学的全部事业，就是重建已经消失的生活。”^①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更广泛、更深入，研究成果也更真实、更可靠。

第一节 在地层中寻找人类的历史

考古学是以古代人类遗留的遗迹和遗物为对象，通过调查、发掘、整理、研究，从而了解、认识并复原人类历史的学科。

那些遗迹和遗物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有三种情况：一是经过调查已知历史上有什么遗迹、遗物，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保护或发掘；二是从文献、传说中了解到线索，经过田野调查，证实其真实性后进行保护或发掘；三是意外的发现，如交通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建设、城镇建设、城镇改造、古建维修等，可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或进行抢救

^①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性发掘。

考古学涉及的方面极其广泛，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又派生出许多专题考古，如冶金考古、陶瓷考古、建筑考古、纺织考古、水文考古、地质考古、农业考古、气象考古、水下考古、艺术考古、音乐考古等。

音乐考古就是因在考古调查、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古乐器和乐谱，以及与音乐有关的绘画、石刻、砖雕等而派生出来的专题考古。

第二节 用智慧聆听古乐

什么是音乐考古学呢？《中国音乐考古学》一书的作者王子初先生认为：“音乐考古学作为以古人音乐活动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为依据了解古人的音乐生活从而阐明人类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这样一门科学，是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纳入专业考古学学科行列的。”音乐考古不同于一般的考古，它有自身的特点。歌唱和演奏一停止，声波消逝，音乐和情景也就没有了。即使不同时代的古人留下了一些乐器、歌谱、琴谱，有关音乐活动的绘画（壁画、岩画）、石刻、砖雕、文献等，现代的人们再也无法听到当时歌唱和演奏的音响，再也不能看见当时的情景。音乐是通过有组织的乐音来创造艺术形象，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主要表现为旋律、节奏、和声、复调和管弦乐法等。欣赏音乐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人的听觉器官，感受那流动的音响，加上欣赏者的想象，再造出音乐形象，感受音乐之美。音乐是审美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以现实美作为音乐的反映对象，它并非直接被物化、被再现，而是通过欣赏者的主观感受间接得到表现，所以音乐不同于其他艺术种类，音乐考古比一般考古更难。

音乐考古要借助一般考古涉及的多门学科知识，如历史学、哲学、人类学、民族学、气象学、冶金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也要借助一般考古采用的各种方法、技术，如田野调查、发掘、断代分析、测音、文物命名、文物分类、碳同位素¹⁴测定等，并借鉴、吸收其研究成果。因为人们不可能专为音乐考古而去发掘，许多与音乐考古有关的实物、绘画，都是一般考古发掘时发现的，所以，音乐考古

工作者必须争取参与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向专家学者学习，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音乐考古的前辈们（如刘复、杨荫浏、李纯一、吕骥等）已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探索之路，有志于音乐考古的人们应勇往直前，继续探索，逐步了解人类音乐活动的历史。

我国音乐考古已有重大发现，如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现曾侯乙编钟共64枚，规模宏大，铸造精美，文饰华丽，钟体、钟架、挂件上有铭文3700字，表明各钟的音阶及其与楚、周、晋、齐、申等国音律的对应关系。同时出土的乐器有编磬一套、建鼓、有柄鼓、扁鼓、悬鼓、十弦琴、五弦琴、瑟、篪、排箫、笙，还有绘有乐舞图的彩漆盒，这是震惊海内外空前的重大发现。又如1986年5月至1987年5月，先后在河南舞阳县贾湖发现的距今8000—9000年的骨笛17支，复原11支，经测定具有七声音阶，还能吹出旋律。

音乐考古将出土乐器分为陶制乐器、石制乐器、青铜乐器（周代乐钟、军旅和宴享乐器）、丝竹乐器（弹拨乐器、吹管乐器）；将音乐图像分为墓葬和佛教音乐图像，乐舞饰绘（岩画和壁画、器皿饰绘）和书籍（音乐书谱）。当人们面对考古发现的各种乐器、绘画、陶乐俑、砖石雕刻等遗存时，看到的是乐器的形象、古人进行音乐活动的场面，而听不到音响，只能凭借考古工作者的智慧，去想象、联想，再通过文献、乐谱间接了解其音乐的内涵。

第三节 回荡在黔山秀水间的音乐

王子初先生《音乐考古》中提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一书按省、市编写，如《湖北卷》、《北京卷》等，其中还没有贵州省的。贵州田野考古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这60年来，贵州考古工作者经几代人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实物、图片、文字等第一手材料，这些收获来之不易，凝聚着他们的汗水和心血。贵州的古代历史，在贵州以外的文献中记载不多，有关考古的文献几乎是空白。于是，一些人认为贵州是“蛮荒之地”、“无古可考”。但是，随着贵州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至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至元明的遗址和墓葬遍及全省，尤以西部为多，基本形成了贵州区域性的系列历史